



红色基因的记忆建构: 基于上海皖南小三线 325 厂的考察

陈宝云

(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0)

摘要: 上海皖南小三线 325 厂, 为探究红色基因微观生成机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切入点。以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 结合 33 位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与相关档案文献, 研究发现: 小三线红色基因是一种在历史实践中动态建构的“功能记忆”, 其生成是国家战略动员、单位制度规训与个体情感内化三重机制交互作用的历史结果。红色基因的叙事结构蕴含着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之间的深刻张力, 这种张力正是红色基因历史真实性与生命厚度的生动呈现。红色基因的当代传承, 本质是一场“记忆再协商”, 最终愿景是构建能够包容历史复杂性的“记忆共同体”。通过对静态遗产的叙事重构来活化“记忆之场”、在教育转化的叙事融合中搭建“记忆之桥”、借助政策支持与代际反哺来拓宽“记忆之维”, 能够有效推动小三线红色基因的有效传承。

关键词: 红色基因; 小三线建设; 325 厂; 文化记忆理论; 记忆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6) 06-0306-09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gene's memor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325 Factory of the Wannan Small Third Line in Shanghai

CHEN Baoyu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hanghai 200090, China)

Abstract: The 325 Factory of Wannan Small Third Line in Shanghai provides an ideal research entry point for exploring the micro-generation of the red gene. With cultural memory theory of Assmann as the bas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is analysis sample, the study sorted out the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rchival documents of 33 participa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Small Third Line red gene is a "functional memory" dynamically constructed in historical practice, and it is historically genera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mechanisms: national strategic mobilization, unit institutional discipline, and individual emotional internalizatio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red gene contains profound tensions between individu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memory, and this tension is the vivid manifes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life depth of the red gene.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the red gene is essentially a "re-negotiation of memory", and the ultimate vision is to build a "memory community" that can accommodate historical complexity. By activating the "memory field" through 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tatic heritage, building the "memory bridge" in the narrativ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ding the "memory dimension" through policy support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 stud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heritance of the red gene.

Key words: red gene; small third-line construction; 325 Factory; cultural memory theory; memory community

三线建设是20世纪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举措。“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①的三线精神是数以万计的建设者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表达,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较多,学者们从国防史^[1]、经济史^[2]、工业遗产保护^[3]、后三线时代^[4-5]、三线精神价值^[6]等不同视角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探讨,成果颇丰。但目前对于小三线能源电力建设及其精神传承的研究相对较少^[7-9]。

三线建设时期的电厂兼具战略属性与技术伦理特征,325厂作为上海皖南小三线的核心自备电厂,是探究红色基因微观生成的典型样本。阿斯曼的记忆理论着重关注记忆的分层与互动,以及功能记忆如何通过筛选和提纯个体经验来服务于集体认同^[10]¹³⁴,该理论能够为剖析红色基因的建构性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例如,石梦希^[11]指出,文化记忆理论具有独特的文化张力以及跨越时空界限的特性,与红色基因传承高度契合。因此,运用阿斯曼记忆理论研究小三线红色基因的微观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325厂为典型案例,基于对33位亲历者的口述访谈以及沪皖等地的档案资料^②,运用阿斯曼的“功能记忆”(functional memory)与记忆分层理论,探讨在远离城市的小三线能源电力建设进程中,“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红色基因如何经由国家、单位与个体三个层面的互动得以构建生成。同时分析当代语境下,上述红色基因面临着的传承困境与创新路径。本文旨在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能源视角的补充,也为理解红色基因传承提供新的理论思路与实践参考。

一、红色基因的内涵阐释

红色基因并非生物学概念,而是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政治文化隐喻。其借用“基因”所蕴含的遗传、复制、稳定特性,用以指代决定政党政治本质与精神特质的核心要素在代际间的传承^[12]。本文所指的红色基因,并非先验且静态的精神标识,而是在特定历史实践中形成,并经后续记忆叙事持续重塑的动态文化符号与价值体系。为深入剖析其建构性本质,本文主要借鉴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将其定义为服务于集体认同塑造的“功能记忆”。阿斯曼认为,功能记忆是“被一个群体采纳并用以巩固其身份的那部分过去”,具有选择性、导向性以及合法性赋予功能^[10]²⁰⁶。

(一)三线建设语境下红色基因的内涵

在本文语境中,红色基因特指于中国三线建设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在国家战略、单位制度与个体生命三者的复杂交互作用下凝练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及情感结构。其精神内核与三线精神“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高度契合,可视为三线精神在上海皖南小三线领域的具体化与实践体现。这一内涵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与建设进程中所倡导的革命精神谱系一脉相承。红色基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苦斗争中淬炼出的政治本色与精神特质,诚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13]因此,本文研究重点并非对该精神内核进行重复性正面阐释,而是揭示其建构、叙事与传承的过程,这也正是“功能记忆”理论提供的分析视角。

(二)325厂个案中红色基因的多重外延

在325厂这一个案中,红色基因的外延具体表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实践维度。其一,在技术伦理维度,体现为在设备与技术受限的条件下披荆斩棘、开拓创新的“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精神,对安全生产规程的严格恪守,以及秉持“故障不过夜”理念的高度责任意识,彰显了“技术报国”的使命感;其二,在集体伦理维度,表现为个人与家庭利益无条件让位于组织需求的“无私奉献”精神,班组车间内外的“团结协作”风尚,以及在艰苦物质条件下的“艰苦奋斗”作风,这些构成了单位共同体的核心行为准则;其三,在情感结构维度,这并非单一的情感体验,而是内在包含着“使命自豪感”与“家庭愧疚感”、“技术优越感”与“地域疏离感”并存的复杂情感谱系。这一维度表明,红色基因并非单纯的道德宣示,而是蕴含着个体代价与情感张力的历史存在。

(三)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红色基因的建构性本质

引入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并非以抽象概念替代历史经验,而是为了揭示红色基因的建构性本质。在阿斯曼的理论体系中,“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的差异在于:前者并非对过去的被动保存,而是

① 2014年,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等在攀枝花市举办首届全国三线建设史研讨会,会议通过的《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二条明确提出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参见: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2024年5月29日发布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第72期第2页。

② 口述史料说明:本文的口述史料源于本课题组2024—2025年采集的33位亲历者访谈,采用分层抽样(亲历者包括回到上海的技术骨干18人、留在池州的职工10人、管理干部2人、职工子女3人),均签署伦理同意书。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进行匿名处理。

为服务于当下集体认同所进行的主动筛选、提纯及叙事化处理^{[10]123-130}。从这一意义而言,三线建设中的红色基因可被视作“功能记忆”的典型形态。它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为叙事架构,对325厂建设者们复杂、多元且充满矛盾的生命经验进行选择提纯;那些与国家叙事高度契合的“使命自豪感”“技术优越感”被反复言说、仪式化并经典化;而那些难以整合的“家庭愧疚感”“地域疏离感”,则在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层级中逐渐被淡化或崇高化。这一过程并非对历史真实性的否定,恰恰是红色基因作为一种鲜活记忆实现代际传递、持续发挥认同塑造功能的内在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所探讨的“红色基因”,是在小三线特定历史时空与战备电厂特定行业单位情境下,融合宏观战略、单位制度与个体生命体验而形成的复合性建构。它既是对特定历史实践的真实提炼,也是服务于当下认同的功能性叙事;其精神内核具有高度稳定性,而表达形态则在记忆的筛选、协商与重构中持续演变。这种兼具“实在性”与“建构性”的双重属性,既赋予其严谨历史研究的价值,也使其亟需审慎的当代传承。

二、上海皖南小三线红色基因生成的三重机制

红色基因并非先验性的精神实体,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上海皖南小三线红色基因的生成亦是如此,它是通过国家战略、单位制度与个体生命三者的复杂建构,得以历史性生成。

(一) 国家战略驱动下的政治动员与空间生产

国家权力是红色基因生成的原始驱动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一宏观布局下,上海在皖南山区建立了以军工生产为核心的“小三线”体系。作为该体系的“动力心脏”,325厂的筹建直接源于巩固国防的战略需求。皖南地区原来工业基础薄弱,东部没有供电网络,西部贵池、东至2个县,虽从贵池铜山矿接有35千伏和6.6千伏电源,但仅个别地区通电,乡村山区无电可供,遇到旱涝就无法抗旱排水。特别是贵池地区,当地电力基础薄弱,最大供电缺口达12 MW,无法支撑八五钢厂等高耗能单位运转^[14]。1967年,上海后方基地党委报告中明确提出:“无稳定电力保障,一切军工生产皆为空谈。”^[15]在此背景下,为配合贵池东至地区建设特殊钢厂和军工单位,1969年12月,由上海望亭发电厂配套筹建上海后方325发电厂。因

此,325电厂也被赋予了“战时能源生命线”的战略使命。

在此,国家不仅通过政策进行动员,更通过空间生产与符号编码来塑造政治记忆。正如阿斯曼所言,国家权力通过空间生产与符号编码塑造政治记忆^[7]。325厂的空间布局凸显了战备时期的特性。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小三线的选址要求“山(靠山)、散(分散)、隐(隐蔽)”^①。325厂经批准选址于皖南贵池县墩上乡晚安村(又称柯村)一处交通闭塞的U型山谷中。这里山势高、山坡陡、山峦重叠、森林茂密、避开交通干线,距最近墩上镇十几公里,进山道路盘旋,有亲历者说是“三里路九道弯”(BLH,访于2025-06-01)。空间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容器^[16]。325厂这种空间隔离既保障了战备安全,也为高度内聚的“单位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物理边界。此外,电厂采用“325”这一数字代号,与八五钢厂、683车队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去地域化、去功能化的保密编码系统。这套系统从符号层面强化了其作为国家战略项目的隐蔽属性与神圣使命,将具体的工厂抽象为国家记忆的符号节点。

(二) 单位共同体形塑下的制度安排与技术伦理规训

单位是承接国家战略、并将其转化为日常实践与伦理规范的关键中层组织。325厂以其“上海属籍、安徽在地”的“飞地”模式^②,形成了独特的治理结构(见表1),并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实践,将宏观政治使命转化为微观的、可操作的“单位伦理”。

表1 325厂跨省单位制的双重属性

管理维度	上海属性	安徽属性
行政管辖	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	贵池县属地备案
户籍制度	上海城镇户口,后方基地集体管理	当地备案登记
物资供给	上海计划调拨 (白糖/香烟/牙膏/肥皂)	本地农副 产品补充
社会保障	上海医疗/退休金	临时医疗点
文化认同	“小上海”社区话语	在地通婚网络

注:根据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档案及建设者口述资料编制。

① “山、散、隐”(靠山、分散、隐蔽)作为三线建设选址原则,最早由周恩来在1964年1月提出,经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等人报告和邓小平批示,正式确立为三线建设的普遍方针。

② 上海小三线与其他小三线有很大不同,它在安徽皖南地区形成了行政管辖独立、户籍制度独立、社会经济系统完全封闭的特殊管理体制,被称为“飞地”模式,是中国三线建设中唯一一个保持完整“飞地”特征的省级小三线基地。崔海霞的专著《飞地: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以及徐有威的论文《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对此皆有讨论。

单位共同体的形塑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制度实践实现:

其一,福利供给与生活控制。后方物资是从上海直接调拨过来,如白糖、香烟、肥皂等,加上五七农场的建设,为职工提供了远优于当地的生活保障^[17]。然而,上海户籍限制导致其无法在皖南地区升学,这使得工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凸显。厂里办有子弟学校,从托儿所到幼儿园到小学,有20多位老师,但是没有初中高中。上海户籍与安徽就学的矛盾也导致了严重的子女教育断层(NX,访于2025-07-18)。这种“福利—代价”的捆绑模式,显著强化了职工对单位的依附性以及集体认同感。正如有研究指出,单位通过福利供给与生活控制能够实现动员^[18]。然而,这种双重属性致使工人处于地域认同与单位忠诚的长期张力状态,此情形构成了小三线红色基因构建的关键语境。

其二,技术权威与师徒传承。年轻人进325厂后,根据人事科安排,分配到各个车间,由车间主任安排师傅带徒弟。师徒签订正规的师徒合同,明确带教内容和考核标准,操作和考试合格,能够达到独立当班的水平,才能满师^[19]。八级钳工刘老(LC,访于2025-07-02)曾严格执行每周抽查打分制度。这种严谨的师徒合同制度,不仅承载着技术的传承,更实现了作风、品德以及认同感的代际延续。技术权威与严格的师徒传承模式,构成了325厂技术伦理的核心要素,是小三线红色基因中“艰苦创业、团结协作”精神得以具身化传承的关键渠道。

其三,安全生产与事故规训。安全生产是后方电厂的生命线,工厂建立了极其严密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除了电力行业必备的“三项规程、十大制度”和四项技术监督外,各个车间建立了政治学习和安全生产技术培训等十六本台账,实现工作有标准,事事有记录;各班组则普遍建立考勤制、工作记录制、站班制、安全生产制、质量验收制、技术培训制、设备区域制、工具保管制、巡回检查制、清洁卫生制等。工厂对事故坚持“三不放过”原则,即对事故原因未查清、责任者未处理、整改措施未落实等情况“不放过”的原则^[17]。亲历者回忆,一旦发生操作差错或设备事故,必会“分析查源,小会讲,大会评”,责任人需要作深刻的思想检讨(WZH,访于2025-07-10)。这种严肃的追责仪式,营造出“安全即政治”的强烈剧场效应,将个人的技术操作与国家战略使命紧密关联,从而将外在规范内化为个体的责任伦理。

其四,竞争性激励仪式。除了全厂广泛开展的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各个车间还会开展“小指标竞赛”(如发电量、煤耗)、技能比武、百日行车安全、先进班组评比等活动,并给予通报表扬、荣誉宣传等精神激励^[17]。单位通过不断提纯和奖励“无私奉献”“技术革新”的行为,塑造和强化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将符合国家需求的行为模式典范化、仪式化。

“飞地”模式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与规训实践设计,进一步形塑了单位共同体的认同感,此乃红色基因落地、使命内化的关键机制。

(三)个体生命内化中的情感张力与认同形成

在国家战略与单位制度的双重影响下,个体生命被深度嵌入历史进程。325厂的建设者们凭借具体的生活体验,主动或被动地将外在的政治使命与单位伦理内化为个人的情感结构和身份认同。这一过程并非单向的观念灌输,而是充斥着复杂矛盾的心理调适,进而形成了独特的“牺牲—补偿”机制与情感张力。

其一,家国使命与个人牺牲的艰难平衡,构成了个体情感张力的核心。这种平衡首先体现在普遍性的亲子分离与家庭缺位上。由于325厂建设动员的紧迫性与迁移的集体性,许多职工中断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职工年均探亲次数仅为1.2次,且因交通极度不便,单程耗时需14小时左右(受访数据统计反馈)。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子女教育的结构性断层:工厂子弟学校开办至小学阶段,上海户籍职工的子女无法在安徽本地升学,导致其在完成小学教育后,不得不面临要么送回上海、苏州等地寄读,要么中断学业的艰难抉择。这种集体性的家庭困境,成为一代三线建设者生命中难以磨灭的深刻烙印。

其二,地域文化落差下的心理冲击,带来了认同调适的初始挑战。从上海、苏州等现代都市突然进入皖南闭塞山区,青年职工们经历了剧烈的文化与环境转换。325厂建设初期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们普遍经历从城市稳定供电到山区油灯照明、从抽水马桶到旱厕蚊蝇滋生的艰难过渡,常年居住于简易的芦席棚内,冬季严寒难以抵御。这种物质生活与文化环境的双重落差,使得“上海回不去,安徽融不进”的地域疏离感,成为当时青年职工群体中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

然而,325厂这种特殊的单位共同体模式也通过双重补偿机制,促使这种情感张力转化为内在认同。一方面,单位赋予其成员技术权威的身份特权。来自上海及望亭的技术工人被尊称为“上海师傅”,其技术权威在当地落后的环境中获得高度认可,形

成了技术精英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单位提供了特殊的物质交换资本。将上海计划调拨的稀缺物资与当地农户交换农副产品,使得职工在物质生活上虽艰苦却享有特殊的交换特权和经济补偿。

正是这种“牺牲—补偿”的复杂互动,催生并固化了个体内在的矛盾情感,如表2所示。从33位亲

表2 受访者个体情感内化的矛盾维度

情感维度	典型话语	历史诱因	访谈话语出现频次/次
使命自豪感	我们保证了供电	保障军工供电	30
家庭愧疚感	对不起孩子	年均探亲1.2次	22
技术优越感	靠我们自己	解决设备故障	20
地域疏离感	上海回不去,安徽融不进	户籍制度与在地排斥	16

总结而言,红色基因的生成,是一个由国家宏观叙事通过单位制度规训,最终落脚于个体生命体验的层层内化过程。国家权力奠定了其战略底色,单位制度铸就了其伦理骨架,而个体的情感张力与认同调适,则赋予了其鲜活而矛盾的生命质感。这三重机制并非简单叠加,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有机整体,共同完成了红色基因从国家话语到个体精神的建构。

三、上海皖南小三线记忆的叙事张力

历史经验并不会自发地转化为精神传统,进而成为可传承的文化基因,其需历经记忆筛选、叙事性重构以及制度化传承等过程,才能够沉淀为可供调用的文化资源。基于对325厂33位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红色基因的记忆呈现出流动性与多重张力。阿斯曼将记忆划分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等分析维度^{[10]131}。该理论框架为剖析皖南小三线记忆叙事的内在逻辑提供了关键支撑。从这三个维度切入,结合记忆政治的核心分析视角,不仅能够系统把握个体记忆的情感脉络、集体记忆的叙事凝练、国家记忆的符号重塑以及三者间的互动博弈与筛选逻辑,更能深刻揭示红色基因在阿斯曼理论视域下作为“功能记忆”的建构性本质。红色基因并非先验固化的精神实体,而是在多元记忆的叙事博弈中,经过选择性筛选、价值性升华,依托具体历史场域动态生成的文化记忆形态,为后文系统阐释记忆叙事的具体特征、剖析红色基因的建构逻辑提供了核心分析依据。

(一)个体记忆中的情感碎片与褶皱

阿斯曼认为,个体记忆根植于亲历者的身体与情感体验,具有鲜明的感觉性、主观性与碎片化特征^{[10]206}。325厂建设者的个体记忆,实则为其精神

历者口述中高频出现的情感维度,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基因在个体层面生成的情感逻辑:它既是使命驱动自豪与优越,也是家庭生活的愧疚与疏离,这种情感结构并非对立的消解,而是并存的内化,共同构成了红色基因在个体生命中最真实、最微观的情感根基。

世界的微观映射,绝非“无私奉献”这一单一标签所能涵盖。其核心价值体现于深刻的情感真实性以及未被宏大叙事全然吸纳的鲜活褶皱。

这些记忆碎片首先闪烁着使命自豪感的辉光。当被问及为何能坚持时,亲历者最直接的回答往往是:“我们保证了供电,这是为了战备,为了国家。”(出现频次30次)这种“使命自豪感”是个体记忆中最愿意主动呈现的层面,其与国家叙事高度契合的荣誉感。然而,记忆的画卷随即展开更复杂的色彩。当话题深入家庭,一种沉寂的家庭愧疚感便浮现出来。“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每年最多见一两次,他长大了跟我们也就不亲了。”(NX,访于2025-07-18)这种基于亲子分离的深切遗憾(出现频次22次),构成了个体记忆中沉重却真实的维度。

记忆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地域疏离感与技术优越感的并存。“刚从上海过来,晚上只有油灯,厕所就是茅坑,冬天芦席棚里脸都能冻出冰碴子,真想家啊,我们几个‘小苏州’跑到后山上哭,那是真哭”。(LRR,访于2025-07-18)这种“地域疏离感”(出现频次16次)生动地记录了文化落差的冲击。但与此同时,“技术优越感”又提供了补偿性的认同支撑:“当地老百姓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上海师傅’能解决,一包‘大前门’香烟能换三只鸡,他们觉得我们很厉害”。(CGJ,访于2025-07-10)

由此可见,个体记忆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矛盾复合体。它既包含与集体叙事共鸣的光荣音符,也保留了大量关于代价、创伤与挣扎的沉寂褶皱。这些褶皱往往被封存在私人领域,却恰恰是口述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它们共同构筑起红色基因最真实、最微观的情感根基。

(二)集体记忆中的叙事提纯与共识凝聚

哈布瓦赫^[20]提出,集体记忆是在群体框架内形

成,并借助制度实现固化的共享叙事。325厂的集体记忆并非个体记忆的简单累加,而是经过单位共同体的一套仪式化机制进行提纯、强化与共享后,所构建的关于技术荣耀与集体奉献的共识性叙事。其功能在于将多元甚至相互矛盾的个体经验,整合为统一的群体认同。这种叙事提纯主要通过以下仪式化实践达成:

一是竞争性荣誉仪式。技能比武、小指标竞赛、先进评比等活动,不仅是生产管理手段,更是强大的记忆塑造仪式。亲历者孙老回忆时依然充满自豪:“我们325的指标在三个厂里最好,我经常带队去312、366厂交流经验。”(SHF,访于2025-06-01)这种记忆选择性地强调了竞争带来的荣誉与优越感,而淡化了竞赛背后的压力与焦虑。另一位亲历者徐老回忆:“每次开大会,黑板上先写上先进工作者的名字,全场表扬,那时候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XF,访于2025-06-27)这些仪式不断奖励符合“无私奉献”规范的行为,将其塑造为集体记忆的核心符号。

二是事故追责的规训仪式。对事故“三不放过”的严肃处理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另一种强化方式。亲历者吴老清晰记得:“一次汽轮机停机,责任人被取消先进称号,全厂开会通报,让大家牢牢记住‘安全是天’。”(WZH,访于2025-07-10)李老也提到:“无论大小事故,都要坚持‘三不放过’,小会讲,大会评。”(LRR,访于2025-07-30)这种“剧场效应”将个人的技术失误上升为关乎集体和国家安全的政治事件,从而将“绝对责任”意识深植于群体的共同记忆之中。

三是宣传口号的日常渗透。“让毛主席睡好觉”“故障不过夜”“保电即保政治”等口号,从政治话语转化为日常生产伦理。此类政治口号如同代码般被反复灌输,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技术实践与宏大政治使命紧密关联,达成了精神层面的制度化,进而成为集体记忆里最简洁、有力的叙事架构。

通过这些仪式化实践,单位共同体成功地将职工多元的个体经验,提炼并强化为“技术自强、无私奉献”的统一集体叙事。那些未能融入此叙事的个体创伤性记忆(如对家庭的愧疚),则在集体层面的交流中被悄然淡化或遮蔽,形成了集体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三)国家记忆中的创伤崇高化与符号重构

国家记忆是在国家权力主导下,服务于合法性建构的功能性记忆。其对325厂红色基因展开的叙事,呈现出高度提纯与重构的特征,核心策略在于将

历史的复杂性转化为崇高且可传播的精神符号。

一方面,国家记忆运作的核心方式是创伤的崇高化转换。它将个体和集体记忆中那些苦涩的、充满挣扎的体验,进行提炼、升华,赋予其崇高的道德价值。最典型的例子是,个体记忆中普遍存在的“亲子分离”与“教育断层”的创伤性体验,在国家叙事中被凝练并升华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崇高奉献口号。这一表述最初源于攀枝花、六盘水等大三线建设者充满悲壮色彩的口头语,后在20世纪90年代经由官方媒体的传播,被固化为概括三线人家国情怀的标准表述^[21]。至此,一段充满个人艰辛的历史,被成功地转换为一种极具感染力和道德感召力的精神符号,其背后的个体代价则在叙事中被悄然淡化。

另一方面,国家记忆通过对空间与数字的符号化编码,将意识形态注入物质载体。325厂及周边“707仓库”“683车队”等数字代号的诞生,本是出于战备保密的实用目的。但在国家记忆的层面,这些数字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的意义,成为一种象征忠诚、奉献与神秘感的政治符号。这些符号标志着一段“隐姓埋名、为国奉献”的光荣岁月。同样,在国家记忆的视角下,厂房墙上“安全发供电,备战为人民”的标语、设备铭牌上镌刻的毛主席语录,既是前文所述空间生产与政治动员的痕迹,更是意识形态的视觉载体,是国家权力将三线建设的物质空间转化为承载红色记忆的纪念空间的明证。正如阿斯曼所指出的:“纪念空间通过选择性地激活或遮蔽记忆,将物质遗存转化为政治认同工具。”^{[10]171}

国家记忆的本质具有“群体关联性、有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的特征^{[10]174},其并非以完整记录历史为目的,而是筛选、提炼出能够服务于当下国家认同与民族精神建设的部分。自2018年起,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将“三线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一同列为新时代需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与奋斗精神。2019年1月,《人民日报》发文再次对三线精神予以肯定^[22]。这集中体现了国家记忆的运作,实现了325厂历史从“工厂个案”到“国家精神谱系”的最终升华。

(四)记忆的张力与筛选性

口述史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够揭示记忆的隐微之处,即那些被平滑、统一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筛选或湮没的历史复杂性。在325厂的历史进程中,记忆的筛选特性体现为:国家记忆与集体记忆所彰显的辉煌岁月,与个体记忆中大量有关家庭愧

疾、地域疏离、生活艰辛的感性细节之间,存在着难以完全消解的张力。

这种张力并非否定红色基因的真实性与价值,而是揭示了其建构性的本质特征。这也表明,“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红色基因并非一种先验性的存在,而是在国家战略叙事、单位共同体治理以及技术实践规训等多重机制作用下,对复杂历史经验持续进行提纯与升华的动态成果。被遮蔽的个体体验与历史细节提醒我们:红色基因的丰富内涵,恰恰蕴含于光荣岁月与亏欠家庭的张力之间;奉献精神真实性,正是源于对巨大代价的克服,而非对代价的忽视。

因此,正视记忆的叙事张力,维护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历史真实与个体主体性,才是对建设者历史主体地位的高度尊重,也才能避免人们所认知的红色基因被简化为扁平化口号,而呈现为在多重叙事博弈中不断生成、充满人性张力的历史进程。

四、记忆建构视域下小三线红色基因的当代传承

以325厂为典型代表的小三线历史叙事,从一段被尘封的过往史实转变为一种被激活的“红色基因”,其实质是记忆持续经历筛选、重构并被赋予当代价值的进程。对其当代传承的探究,不应局限于具体举措的罗列,而应上升至理论层面的反思,即基于其“功能记忆”的属性与分层特征,我们应如何理解并践行这种传承?如前文所述,传承可理解为记忆场域中不同叙事力量的再度博弈,其核心目标是从同质化叙事占据主导的格局,转向构建能够包容历史复杂性的“记忆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并非封闭的身份认同,而是保持反思性开放的对话空间。因此,上海皖南小三线红色基因的传承可从以下三条路径展开探索。

(一)从静态保护到叙事重构,活化“记忆之场”

工业遗产作为传承的物质基础,若仅实现保存,遗产将处于缄默状态。依据阿斯曼的“记忆场”(sites of memory)理论,三线厂房、控制室以及墙上的标语,其价值不应局限于建筑学范畴,更是记忆的媒介与触点。当前面临的深层次困境在于,如何将这些物理空间从静止的遗址转化为能够激发对话、容纳多元叙事的动态记忆场。

当前部分三线建设相关传承实践仍存在明显不足,例如一些早期三线展示馆的内容呈现较为粗疏,核心问题在于其仅对记忆叙事进行简单压缩,片面

重复国家记忆的宏大叙事框架,却刻意过滤掉单位记忆的具体实践细节与个体记忆中蕴含的情感褶皱,未能呈现前文所提及的个体、集体与国家记忆之间的互动博弈与张力。事实上,红色记忆的真正活化,关键在于能否借助展示空间等载体,将多元记忆张力具象化、可感知化。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的相关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其采用“图文叙事+多媒体互动+实景复原”三位一体的展陈方式,并构建了“参观学习+情景党课+互动体验+研讨交流”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使三线历史具有可感知性^[23]。

在展示325厂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还应通过场景复原、音频装置或家属口述访谈录像等方式,使建设者们的地域疏离感与家庭愧疚感等情感内容成为可被感知的历史组成部分。当前日臻成熟的数字化技术可为多维度的叙事重构提供技术支撑,使数字档案成为一个可访问、可探索、可解读的记忆矩阵。进一步而言,在区域合作的背景下,可尝试构建“长三角小三线电力工业遗产廊道”。此设想与《长江上游岸线工业遗产数字谱系与区域协同传播机制研究》^①等国家项目内容相符。该廊道通过连接上海(技术输出地、杨树浦电厂)、泾县312厂、贵池325厂等节点,系统地重现小三线建设作为一项国家工程的宏观逻辑与微观体验。在这一网络中,可打造线上的小三线家庭档案馆数字平台以及线下的家庭档案体验日,其目的不仅在于展示物件,更在于激发记忆的流动与共享,促使分散的个人记忆与家庭故事重新建立连接、产生碰撞并展开对话。

(二)教育转化中的叙事融合,搭建“记忆之桥”

教育作为记忆协商的关键场域,其目标并非单纯的价值植入,而是培育具备历史思辨能力的认同。当前的教育实践中,部分院校将三线建设历史及三线精神等内容融入“课程思政”或“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此类探索意义重大,然而多聚焦于弘扬奉献精神与光辉历程,在历史复杂性的呈现以及思辨性引导方面存在一定欠缺。

基于前文分析,教育转化的深层次挑战与创新方向在于,如何构建一座连接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的“记忆桥梁”。吉安市青原区的实践提供了范例。当地通过开设“公略讲堂”、打造“博物馆+学校+烈

^① 该项目是重庆师范大学杜翼老师立项的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2025年有关三线建设研究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分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清单可参考网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763286。

士陵园”三位一体的教育平台,并创新教学模式,例如将红色诗词改编成歌曲、编排情景短剧、开展沉浸式教学、组织“时空信箱”活动等,显著提升了历史的感染力与思辨性^[24]。因此,在阐释325厂“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精神时,应融入那代人“枕木铺路”“胶球清洗”(SXX,访于2025-07-18)等技术实践细节,使其中蕴含的智慧与付出的艰辛可被感知;在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时,应引导学生了解“年均探亲1.2次”“子女教育断层”等情感层面的代价。此举并非削弱精神的崇高性,而是通过展现历史的完整面貌,让学生体悟“奉献”的真实分量,进而实现从价值灌输向价值理解与认同的转变。

阿斯曼的记忆理论表明,真正的记忆传承,应具备接纳对话与反思的特性。这一理念启示我们,教育领域应当积极将“记忆的褶皱”——即个体记忆中蕴含的代价、创伤与情感挣扎,转化为培养学生历史思辨能力的珍贵资源。举例而言,可通过设置专题研讨课程,引导学生对比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中呈现的“技术自豪”与“家庭愧疚”等矛盾情感,探究国家战略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此一来,赓续红色基因不再是记住教科书里扁平化的结论,而是融入个体能够被感知、探讨、质疑并最终实现内化的立体且真实的历史情境。在反思与对话中,红色基因可以得到更深层次、更具可持续性的传承。

(三)政策支持与代际反哺,构成“记忆之维”

可持续的传承需依托系统性的政策扶持与多元主体的参与。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与基金支持是重要驱动力。2025年,三线建设研究获得7项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一情况释放出明确信号,即三线建设研究及其精神传承已成为国家层面重点关注的学术研究方向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点。这些项目所强调的抢救性口述史料收集与数字技术赋能,为325厂的传承工作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思路。

与此同时,代际反哺现象正为传承赋予鲜活的生命力。建设者的后代(通常被称为“厂二代”“厂三代”)正成为记忆传承的新兴力量,他们主动借助新媒体或联谊会探寻家族^①发展轨迹。例如,325厂“厂三代”查先生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开展小三线历史及遗迹故事的研究与探索,并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自主宣传小三线历史(ZXX,访于2025-06-29)。他们的努力实质上是将“功能记忆”与基于家族情感的“存储记忆”相融合,同时突破官方叙事框架,为记忆场增添了鲜活的情感色彩与个人化视角,是构建包

容性记忆共同体的重要社会基础。

最终,传承的愿景在于构建一个跨越地域与代际的“记忆共同体”。这要求地方政府积极履行职责,例如,攀枝花市东区党史研究室采用“部门协作、街镇联动、社会参与”的模式,将分散的红色资源整合为红色基地集群,并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规划旅游线路,实现文化成果的惠民共享^[25]。对于325厂等三线企业或遗迹而言,传承不再是孤立的单点责任,而是转变为整个区域社会共同参与的、动态的文化生产进程。唯有如此,才能使三线精神传承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寻、对话与重构,进而真正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彰显新的生命力。

五、结 语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及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历史实践,深入研究并传承其中蕴含的三线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口述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依托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对上海皖南小三线325厂红色基因的生成、叙事及传承机制展开系统考察,得到三点结论:其一,红色基因是在历史实践中动态构建的功能性记忆。它并非先验的精神实体,而是在国家战略动员、单位制度规训以及个体情感内化这三重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历史性地生成的。其精神内核既是国家工业化与国防建设实践的真实凝练,也是国家权力对个体经验进行吸纳、筛选与升华的成果。其二,红色基因的叙事结构蕴含着深刻的张力,此张力是其历史真实性的根本标识。个体记忆中的技术自豪感与家庭创伤、集体记忆中的叙事提纯、国家记忆中的创伤崇高化,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叠加关系,而是存在持续的筛选与协商。这种张力不仅无损于红色基因的价值,反而是其具有深厚生命力的根源。其三,红色基因的当代传承,本质上是一场“记忆再协商”,其目标是构建包容历史复杂性的“记忆共同体”。传承并非对既定精神符号的单向传播,而应是对多元记忆主体的激活与对话,需通过遗产活化、教育转化与区域协同,将“记忆的褶皱”转化为可被感知、思辨的精神资源。

本文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了能源电厂这一微观

① 比如上海大学陈和丰(祖父为312电厂职工)在“家·春秋口述史计划”中,通过家族照片、往来书信等私人物品激活了集体记忆。我们访谈的325厂“厂二代”和“厂三代”也有类似的努力。比如“厂三代”查先生虽然不在电力系统工作了,但是在父母和祖辈熏陶下对小三线也有独特情感。大多数“厂二代”对325都有深厚感情,有自己的联谊会,非常团结。(WZH,访于2025-07-10)

视角,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三线能源领域关注不足的短板。将文化记忆理论引入红色基因研究,不仅揭示了红色基因作为“功能记忆”的建构性本质及其内在张力机制,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为工业遗产与集体记忆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参考,为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指明了可探索的方向。当然,鉴于个案研究典型性的局限,本文结论向其他类型三线企业或工业遗产的推广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未来,多案例比较研究、“厂二代”“厂三代”的代际记忆传递机制等相关议题,均有待开展更为深入的探究,以期进一步丰富三线建设与红色基因传承的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 [1] 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二辑):小三线建设与国防现代化[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
- [2] 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 [3] 吕建昌.三线建设与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刍议[J].学术界,2023(4):124-131.
- [4] 徐有威,凌子晴.上海小三线建设支农工研究[M]//北大史学(第28辑):近现代城乡经济与社会专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131-150.
- [5] 张胜.安徽小三线企业调整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25(2):2.
- [6] 梁建良,刘彦龙,王梅,等.三线精神的时代价值与传播路径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5):146-157.
- [7] 卢哲凡.三线建设的经济史研究述评[J].信阳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5(3):44-49.
- [8] 徐有威,张杨.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现状、特征与推进路径[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5):124-133.
- [9] 瞿商,黄一栩.三线建设研究述评与展望[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57-68.
- [10] 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11] 石梦希.文化记忆视域下传承红色基因的理论逻辑和实现途径[J].办公室业务,2023(23):76-78.
- [12] 孙维雁.传承红色基因 增强新时代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N].光明日报,2023-06-02(06).
- [13]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代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4-18.
- [14] 八一二指挥部、华东电业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后方后三年电力建设规划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B67-2-37[A].上海:上海档案馆馆藏,1969-07.
- [15] 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 B1-9-405[A].上海:上海档案馆馆藏,1981-07-11.
- [16]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21:404.
- [17] 三二五电厂填报的大庆式企业审批登记表 B67-2-339-61[A].上海:上海档案馆馆藏,1978-02-01.
- [18] 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47.
- [19] 上海后方三二五厂运行车间炉运甲班先进事迹的介绍提纲 B67-2-372-123[A].上海:上海档案馆馆藏,1979-01-06.
- [20]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3:1-2.
- [22] 孟祥夫.三线精神:再艰难也没人喊苦喊累[N].人民日报,2019-01-17(04).
- [23]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深挖活用“三线资源” 激活红色基因“活态档案”[N].光明日报,2025-11-18(12).
- [24] 井冈山报.薪火相传 红色不辍:我市探索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新路径[EB/OL].(2024-03-12)[2026-03-09].<https://www.jian.gov.cn/news-show-86894.html>.
- [25] 攀枝花市东区党史研究室: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传承发扬三线精神[EB/OL].(2025-05-28)[2026-03-09].<http://www.scds.org.cn/2025-5/28/780-131-28228.htm>.

(责任编辑:陈丽琼)